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我在中国銀行的一些回忆……馮耿光（1）
忆語随笔……曾毓隽（20）
复辟之役馬厂誓师亲历記……陈文运（33）
我参加討伐张勋复辟之回忆 ……叶恭綽（51）
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 ……苏錫麟（59）
吳光新在长江上游的兴敗 ……劉澤普（72）
参战軍与直皖战爭概述 ……韓世儒（78）
我在王占元幕下的活动片断 ……楊文愷（90）
直皖战后直系势力的扩张 ……湯薌銘（99）
1921年直軍援鄂的经过……张方严（105）
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紀要……宁　武（115）
二次直奉战时閻錫山与直奉皖
　軍閥的勾心斗角 ……周　玳（122）
第二次直奉战爭随軍見聞 ……謝宗陶（141）
吳佩孚敗退天津瑣記 ……潘承祿（158）
吳佩孚之再起与潰敗 ……李炳之（162）
1926年吳佩孚的重返洛阳 ……王維城（179）
吳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中的
　陰謀活动 ……黃应乾　陈祖武　刘克俊（183）
张宗昌兴敗紀略 ……王翰鳴（210）
段祺瑞公館見聞 ……王楚卿（236）

附注

对《吴光新在长江上游的兴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一辑二七五页

对《段祺瑞公馆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一辑二七六页

我在中国銀行的一些回忆*

馮　耿　光

我自从1918年3月到中国銀行（以下簡称中行）担任总裁算起，到今年已经有四十五年了。在解放前的三十几年中，1928年前我曾两度担任总裁，以后一直专任常务董事，只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改任高等顧問。解放后，中行改組获得新生，我又重新担任董事，不覚又已十四年。

1918年，我在临城矿务局任督办，这个矿局是由华比銀行投資中外合办的。督办由中国方面委派，薪金按法郎計算，最初待遇很丰，后来因法郎貶值，逐漸降低。馮国璋到北京就代理大总統后，曾有意要我担任陆軍次长，我虽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但只在很短时期中帶过部队，对于政治一向不感兴趣，因此我对于这一职务很覚躊躇。正在这时，王克敏做了財政总长，要想找一个和馮有淵源的人担任中行总裁，遂来拉我去接替他这一职务。我熟思之后，就决定到中行来。四十五年来，我在中行的职务，虽有变更，始終沒有脫离过。現在把我在中行经历的重大事情，就記忆所及，概述数事于下：

---

* 附注：馮耿光字幼伟，广东省中山县人，現年八十一岁，日本士官学校第二期毕业，曾任清政府軍諮府第二厅厅长，北洋政府总統府顧問，中国銀行总裁，新华銀行董事长。解放后，任中国銀行和公私合营銀行董事。这稿为馮口述，由林汉甫記录整理。

从反对袁世凱称帝说起

袁世凱称帝前，梁启超、蔡锷等密謀反对。王克敏清末曾在日本任留学生监督，与梁启超結识很早，交情不浅。1913年王在中法实业銀行做中国方面的代表时，曾替袁世凱向該行借到一笔錢，但沒有密切关系。由于他的官癮很大，喜欢热鬧場面，遂经常参与梁、蔡的密謀。我那时是总統府顧問兼临城矿务局督办，事情很閑，也常和他們在一起活动。我們这帮人当时虽对袁认识不清，但贊成共和、反对帝制是一致的。有一天，蔡松坡相识的妓女小凤仙問蔡为什么反对袁世凱做皇帝，蔡說："現在我們大家見面拉拉手就行了，如果让袁做了皇帝，我們就要向他跪拜，那还受得了。"蔡在云南起义后，即率部队进攻四川。唐繼尧的部队跟在后面，态度不十分明朗，如果蔡部軍事不很得手，唐部很可能叛变。

就在这时，我到天津，住在利順德飯店，遇見王克敏，他邀我去見进步党負責策划的人——蹇念益(季常)。蹇把当时形势讲給我們听，认为必須北方軍人中有人起来响应，蔡的声势才能壯大，反对帝制的起义才能成功。蹇的意思要我赶快到南京去見馮国璋，劝他早日表明态度。我看到此事关系重大，立即答应下来。这时袁的密探布滿在交通要道和头二等火車中，必須机密行事。当天我就乘三等車南下，到南京时正値午夜一点多钟。我乘車到馮居住的上将軍府(即太平天国天王府旧址)，門卫問我来意，我托辞找馮的上菜工友，混进府去，以免惹人注意。这一上菜工友在前清軍諮府做过事，人很机警，这时是馮的亲信。我与他見面后，即嘱其不要声张，将我引到签押房和馮密談。

馮問到外面情形，我就把各地反对帝制的局势告訴他，并問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手下有多少軍队，打算怎么办？馮說嫡系軍队有限的很，所以不敢轻率举动。我就乘机进言說，袁派了两路大軍沿着京汉、津浦两铁路南下，表面上是和西南方面作战，实际上对馮也是一种威胁，必須早日表明态度，才是自全之道。馮說："袁是老上司，如何可以反对。"我說："袁如不做皇帝，还可以保全大总統的地位。反对帝制，就是为了袁本人和其子女后代的安全，正是爱护老上司。"馮听了我这番話，劝袁退位的意思才最后决定，立刻吩咐一位賀秘书当晚草拟电稿。次晨我見到馮时，他已坐在那里看电稿，经我一同斟酌，稍加潤色，即于是晨6时发出。

这封电报拍发以后，整个政局为之一变。进步党梁启超等通过王克敏和我与馮拉上关系。后来馮任代理大总統，梁任财政总长，王和张嘉璈任中行正副总裁。后王接任财政总长，就約我去接替他的职务。我和馮系前清軍諮府老同事，认识最早，交情也很深，但担任中行总裁，却是梁、王的主意，不是馮自己找我的。

王克敏与张嘉璈在中行

在1918年到1928年間，中行总处主要是由王克敏、张嘉璈和我三人共同負責主持，遇事大家商量，分别联系办理。王和我均先后两度担任总裁，张則一直担任副总裁，具体主持銀行业务，沒有更动过。

我和王很早就认识。他的父亲王子展（存善），一向在广东做官，交游很广，与我家有世交，因此我和王家父子都很熟悉。王在清末从日本回国，因为他的父亲和直隶总督陈夔龙（筱石）有交情，由陈保举他做天津交涉使。辛亥革命后，馮国璋調任直隶省都督，王仍任交涉使，我曾从中介紹，这是馮、王結识之始。有一次馮在交涉

使署宴請各国駐天津領事，馮的卫兵不滿意所发的軍飯錢，吵鬧起来，王不顧情面，当場申斥。馮对王的举动不但不見怪，回到都督府还惩办了鬧事的卫兵，因此两人的交情倒反而更深一层。王经手中法实业銀行借款[①]时，袁世凱送給他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那时他因为眼睛不好，住在北京六国飯店，要由人扶到总統府去签字，他回到飯店时，曾拿这张支票要我替他瞧瞧金額，并問我要不要拿点錢去用。我对他开玩笑說："至少要分我一半，少了沒有用。"这笔錢在当时为数不小，很可以供他揮霍一陣。王在北方很久，对于軍政界各方面人物，都有拉攏，人很机警，政治嗅覚也灵敏。我們在这方面时常要靠他代为筹划应付，特别是在曹錕、张作霖等人当权时期，中行对外交涉，都是由他出面进行。他在中行多年，关系很深，但对于行里人事，除了两次大裁員外，很少过問。在历次政潮中，中行也沒有因为王的政治活动而卷入漩渦中去。

张嘉璈是日本庆应大学出身，在未进中行前，曾在浙江省議会和北京參議院做过秘书，很为王家襄所信任。他到中行来，大概是通过进步党的关系[②]。他那时年紀很轻，但一般朋友、同事都认为他是政客，有时大家談得很热鬧，他一来到，談鋒馬上冷淡下来。1916年中、交停兌时，张在上海分行任副经理，曾与经理宋汉章共同筹划，抗拒北洋政府停兌命令，照常兌現，在对外宣传联絡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但两人相处始終不甚融洽。宋也是经常用"政客"两个字来形容张的举动。有一个时期"政客"两个字几乎成为张的綽

① 大概是1913年10月的"中法实业借款"。这笔借款为法金一亿佛郎，折合关銀三千九百三十七万余两，而袁世凱政府实收的只有三千零六十八万余两。

② 张嘉璈的哥哥张君勱（嘉森）和梁启超、湯覚頓都是进步党的主要人物。张进中国銀行是在湯覚頓任总裁时期，主要是通过梁的推荐。

号。北伐前几年，每逢中行准备发股息时，我就要电約汉口、杭州两行经理同到上海和宋汉章磋商分担垫款办法。有时宋問我的来意，我回答說："这不用我說，你心里也明白。"宋問我垫款几时可还，我說："有錢就还，沒錢就慢点还。"宋认为我說話实在，不像张那样虛伪，說話吞吞吐吐地靠不住，常常約期准还，到期仍然还不了。平心而論，张对于銀行业务经营比較內行，和上海金融界蔣抑卮、李馥蓀、陈光甫等素有联絡，因此在股东会等方面具有一部分力量。他自到行以后，苦心規划行务，貢献很大。宋汉章的話，也只是一面之詞而已。

我和王、张两人結交有先后，彼此性格和能力也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都想把中行办好，必須維持它的相对独立性，尽量扩大商股权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北洋政府财政部因为需款应用，经常将該部持有的中行股票抵借款項，我們就慫恿他們陆续让售給商业銀行，到北伐前夕，官股为数极少，只剩五万元了。

京鈔停兌后的整理

我就任中行总裁时，北京中行鈔票停兌（即不能兌現洋），已将近两年，市面上鈔票行市时有涨落。北京的銀行、銀号，做这种京鈔买卖投机的很多，其中有一大生銀行的经理，名叫张鴻卿，最为活跃。因此社会上流传的一句联語是："大財神人称燕老（梁士詒字燕孙，有五路財神之称。有人說民五停兌是他的主张），小錢鬼我怕鴻卿。"可見当时京鈔投机的猖獗了。

北洋政府在宣布停兌时，仅凭国务院一紙命令，上海等地紛起抗命，照常兌現。結果只有北京一地，中交两行（中国、交通两銀

行的簡称，下同）发鈔最多，停兌最久，为害也最烈。北洋政府不但放任中、交京鈔在市面上自由买卖，而且还继续向中、交两行大量濫借不兌現的鈔票，推行到市面上去。当1916年5月12日停兌时，中行京鈔发行及存款数共为二千六百余万元，到了1917年12月底，增加到六千五百余万元①，京鈔的行市也跌落到六折。一般机关官吏，拿到不断跌价的鈔票，不能維持生活，叫苦連天。

我就任中行总裁以后，每逢在公共場所，听到人們談到中行京鈔的行市，又已跌到几折了，总覚得非常刺耳，頻想早日設法加以整理恢复兌現，才能对得起社会輿論，否則連中行的生存命运，也要断送了。因此我在最初二、三年中就经常和中行同事在一起研究如何整理京鈔。梁启超任財政总长时，原有将各国应允緩付的庚子賠款用来整理中、交两行鈔票的拟議。我到中行后，旧事重提，由中、交两行联合呈請政府指定此項緩付賠款及常关稅作担保，发行七年长短期公債，归还两行墊款，收回京鈔，总額共計九千三百万元，由1918年5月1日开始发行。但第一次发行的成績不好，截至同年6月29日止，中、交两行共募得四千四百余万元，不及全数之半。且以財政困难，京鈔一面收回，一面发出，增发数实际上超过收回数，鈔价亦随之趋跌，引起各方面的責难。中行乃于同年9月呈报財政部，詳述維持京鈔及整理无效的原因，要求政府不再命令墊发鈔券。輿論方面对于銀行和財政混成一片，攻击尤甚。財政部遂于是月18日行文中、交两行，正式保证不再令两行墊付京鈔。这是整理京鈔的重要关鍵。

中行自停止墊款后頓呈生机，即向各分行及中外各銀行商借

① 这些具体数字和日期，是由記录整理人林汉甫查考有关資料予以补正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現金，收縮京鈔。以前售余的公債，也由財政部明令继续发行售募，計自是年10月12日至次年10月4日一年間共募得长短期公債各一千三百余万元，收回京鈔二千六百余万元。中、交两行京鈔流通數目，从1918年4月30日公債发行前的九千三百万元压縮到1919年10月4日的三千八百万元，減少約六成。但中、交京鈔市价仍在五折之間，不但不見上升反而下降。各方面紛紛提出整理办法，中行股东联合会在上海开会时，也有具体建議。适中行修改則例問題又在临时議会引起风波，中行京鈔市价較交行京鈔更为低落。

直到1920年春間，因新銀行团在巴黎組成又有大借款成立之說，鈔价逐步上升到七折。中、交两行认为整理較易着手，便呈請政府发行公債，將京鈔全部收回。但以各地战事又起，未能实現。且因直皖两軍在京津一带作战，人心恐慌，于是鈔价跌到四折左右的历年最低价。其后战事他移，財政部于9月19日重申前請，呈准政府以关余为担保，自10月1日起发行九年整理金融公債六千万元，除以二千四百万元归还銀行垫款外，余数按照票面收回中、交两行京鈔，以四个月为期，并規定逾期以后京鈔停止流通，无論公私机关，不得再有出入，亦不准再有行市。如京鈔持有人及存戶不願购买公債，准其分向中、交两行換立分期归还的現金存单，其利率期限悉与公債相同。所有收回的京鈔，一律切角燒毀。

这时，京鈔数額，已較前大为減少，流通既有限期，商民不敢观望，投机家也受到限制；且多数积存在各路局及稅收机关，收銷較易。遂在四个月期限內，发售公債五千八百余万元，除归还銀行垫款外，換回中、交京鈔三千四百余万元。所余公債一百九十余万元，分交中、交两行作为兌換零星京鈔之用。京鈔收回工作至是基本上告一段落。

中行因为财政部发給的公債，不敷归还垫款，京鈔轉为存款者踴众，致发出定期存单二千二百余万元，負担甚重，而本身資金不足以应付，乃由王克敏、张嘉璈、吳震修（荣鬯，时任京行副经理）和我共同商量，另行添招商股四百万元，补充实力。不料上海发生证交风潮，因而未能招募足額，头寸仍很紧迫。所有各項京鈔存单自1921年第三期起未能如約履行照付，不得已又与存戶协商仍用金融公債換回前出存单。但中行所存債券，因筹借政府垫款，多已陆续变抵，只好在1922年下半年再向各商业銀行借入金融公債一千万元，以換回存单。所借公債，按照票面金額，分为六十一个月归还本利，由总行及沪、津、汉三行共同負担。这样，中行京鈔存单的結束，又拖延了五年之久。中行董事会在1929年报告中曾指出："其后此六千五百余万不兌現紙币之整理，半由政府发行公債，半由本行自筹資金，其間困应补苴，費十年之力，直至民国十六年，始首尾清結。論国家，論銀行，其受損失，固不待言，而他日談我国币制者，此实一不可忘之事实。"

有些投机商人，在京鈔整理过程中，受到打击，故极力反对、阻撓。交通京行经理胡笔江利用交行京鈔作为投机工具，結交官府在市場上操纵获利，对整理京鈔很不贊成，后来看到反对无效，便挾带投机所得巨資，辞职到上海去。大生銀行张鴻卿曾对我說过："你們政府銀行发行的鈔票，又何必兌現呢？"他虽不懂什么貨币原理，其主张却和国民党政府一样，只是北洋政府的手段，远不如蔣介石国民党那样毒辣罢了。

安福系阴谋夺取中行

1913年頒布的中行則例，規定中行的总裁、副总裁由政府簡

任，造成了該行主持人随着財政总长的更換而进退的局面。自从該行正式成立到1917年不到五年期間，前后担任总裁、副总裁的共有十一人之多①，中行就此成为財政部的外府，也是各派政客官僚爭夺的对象。1917年10月梁启超任財政总长时，約請日本財政学家堀江归一博士到北京演讲貨币銀行問題，并就中行修改則例，恢复兌現等事，提供意見。堀江认为"欲恢复兌現，非先停止增发鈔票不可；欲停止增发，非停止垫款不可。然欲停止垫款，則不可不变更組织，使保持銀行之独立，不随政治为轉移"。因此他极力主张正副总裁由政府在股东会所选举的董事中任命。第二年財政部重新修改的中行則例，就采用堀江的建議。則例明文規定总裁、副总裁由政府于董事中簡任，而董事則由股东大会选举，任期四年。我就是由中行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再由政府簡任为总裁。后来財政总长虽然时有更換，中行正副总裁，按照則例規定，不再随之进退。这样，中行才脫离了北京政局更迭的影响，整个局面开始稳定下来。

孰知到了1919年安福系得势，又发生很大的风波。安福系政客想夺取中行的管理权，借口中行新則例只由馮国璋以代理大总統命令公布施行，当时国会解散，沒有经过立法程序。該系議員乃在临时議会参众两院，提出修改中行則例的新議案，要把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产生等規定完全取消。但是各地中行商股股东普遍反对，西南軍政府和各地方商会等方面亦都通电指責。北洋政府总統

---

① 自1913年4月中国銀行正式成立到1917年6月，先后担任总裁、副总裁的計有：孙多森（蔭庭）、聶其煒（管臣）；陈威（公孟）、吳乃深（蓋臣）；湯叡（觉頓）、項藻馨（兰生）；薩福琳（桐孙）、李士伟（伯芝）；周自齐（子廙）、徐恩元（荣光）、俞凤韶（寰澄）等十一人。

徐世昌和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看到情势不妙，也主张慎重，該案才以"付审查"为名搁置下来。然而安福系政客并不甘心，仍利用同年4月中行股东会在北京江西会館开会的机会，进行捣乱，串通少数股东到会质問中行当局，企图恢复1913年旧則例，引起激烈的辯論。但因行方握有多数股权，終于否决了他們的提案。这年冬天，該系議員王伊文等又在众議院，提出查办中行正副总裁案。在未提出之前，特托人向我示意，我一笑置之，并致书友人云："我对于此案不特不为疎通，且盼其成立，依法行查，借明眞相，未始非銀行之福也。国家財政，久无办法，国家銀行，又何能办，故久有求去之意，不过今日尚非其时耳。現在既有責难，只可鎮靜以待，若因此遽行求去，則我將何辞以自解。"等到該案提出通过后，中行即遵陈经过，呈請財政部彻查。財政部派員形式上查了一通后咨复众議院，同时我們又从人事上对該系部分政客进行联絡，軒然大波才平息下来。

1921年中交两行的挤兑风潮

1921年秋冬之交，交通銀行总理曹汝霖搬到北京佟府夾道新房子里去。这房子有一个小型戏台，可以招待一、二百人看戏。亲友們遂在11月16日以祝寿为名，举办了一个堂会，大家凑凑热閙。孰知戏碼已经排定，將要开演，忽然有人来报告，北京中、交两行同时发生挤兑风潮。那时中、交的不兑現京鈔，已经全部收回，但实力不充，加之財政部在这年又先后向中、交两行借垫軍警餉款四百八十万元及公債基金垫款七百万元，因此新发兑現鈔票的現金准备，极为缺乏；此外还有大量以京鈔掉換的定期存单，流在外面，即將到期。这些因素就是引起挤兑的原因。

这次挤兑风潮，因为头寸短缺，两行一开始时便采用限制兑现的办法。每有钞票五元，只兑付现洋一元，余四元仍付钞票；且于付款时，故意将现洋反复敲打，手续异常緩慢。只听見叮当叮当的声音不絕于耳，十分热鬧，实际上是为了多拖延时間，少兑出現洋。后来連一点現洋亦不搭付，等于停兑了，于是中、交鈔票在市面上又有了行市，其情形的严重，不亚于1916年的停兑风潮。中、交两行都感到內部空虛，彼此互相探听对方实力情形，生怕倒閉在对方的前头。

当时北京的步軍統領王怀庆对于挤兑风潮，非常注意，曾经会同內务部、京师警察厅共三方面代表，深夜召集中、交总行負責人去談話。我和张嘉璈代表中行，曹汝霖、任振采(凤苞)代表交行，接連去了好几次。王怀庆和內务部、警察厅的代表坐在长桌的上首，我等坐在下首，問話时态度严肃，一再追問中、交两行的現款到哪里去了，是不是私人挪用了，对于交行尤其不客气。有一次，警察厅长殷鴻寿說："若在外县，发生有錢庄停兑倒閉等情事，经理人是要枷首示众清查財产的。这次在北京城里，客客气气，还不好好交代清楚。"我听后气憤极了，就站起来說："今天我們四个人都在此地，可以暫时拘禁起来，請派大員彻底清查中、交两行賬目。如果有私人挪用公款，以致发生风潮，情願以身家生命抵偿。"王怀庆看到这一局面弄僵了，就說："您不必动气，大家坐下来好好談談，想个办法，应付这个局面。"这才緩和了全場的沉重空气。经过中、交当局向各方面疏通，終于把这事擱下来。因为这次問話，是由三个官厅共同召集的，我們就把它叫做"三堂会审"。

中行的亏空沒有交行大，京、津两行又由沪行宋汉章等装来現洋接济，因而这次风潮，经过半个月的紛扰就解决了。交行风潮拖

延較久，最后听說由叶恭綽经手，向奉天省官銀号借到現洋四百万元，于次年1月間对外无限制兌現，才把风潮平息下去。

张志潭是直系大将，在靳云鵬內閣中先后做过农商、內务、交通三部总长，对于中、交两行的态度，显然有所不同。遇有关于銀行方面的事，处处与交行为难，大有非挤垮不可之势。这次风潮发生后，他时常問我交行內容如何。我和他原有世交，彼此相识多年，交情不錯，但他为什么对交行如此痛恨，最初我还不大明白。直等到梁士詒由张作霖保駕做了国务总理，吳佩孚通电攻击张、梁，常要牵涉到交行，才知道这完全是一种派系的傾軋。后来奉系失敗，梁士詒下台，交行发生动摇，幸由股东联合会推举张謇、錢新之（永銘）担任总理、协理，才把局势挽救过来。

几任总裁的更替

我从接任总裁后，先是应付京鈔停兌后的局面。京鈔的整理、兌現刚告一段落，1921年挤兌风潮又突然发生，虽在两星期后就归于平息，我个人却不願再干下去了。我对王克敏說："这一局面，我实在应付不了，还是仍由你来担任总裁吧！"我的母亲也說我年刚四十不宜負此重任。因此第二年（1922年）第二届董事会就改推王克敏为总裁，我退居常务董事之职，副总裁仍由张嘉璈担任。王就职后，因为全行开支庞大，曾大批裁減总处人員，并于次年在济南召集经理会議，商定各分行担負总处开支及維持京行的詳細办法；又組织业务委員会，各分行经理担任委員，共同解决各分行的善后問題。

王接任不过一年光景，又去做財政总长，中行总裁职务，由董事会改推金邦（仍珠）担任。金曾在梁启超任財政总长时做过財政

次长，后由浙江兴业銀行叶景葵、蔣抑卮等人推荐，做了中行董事。金在我們这些人中，年事稍长，作风稳健，一切措施，率由旧章，不轻易更动。中行业务，在他任期內，也逐漸走上稳步进展的道路。1926年第三届董事会成立，他继续担任总裁，但因病重不能到行执行职务。王克敏又以其他原因，不便出面，我遂再度被推为总裁。这时北方已在奉軍控制之下，政治、经济紊乱达于极点。

早在1925年，中行香港分行经理貝淞孙（祖詒）就写信給北京总处，报告国民党自从1924年改組以后，有国际援助，声势很好。第二年北伐开始，貝又报告国民党政府向广州銀鏡业借款八十万元，雇用挑夫把現洋放在砖头下面，挑过粤赣边界大庾岭，作为中央銀行的发行准备，并且說北伐軍力量雄厚，組织严密，胜利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打敗北方軍閥。王克敏、张嘉璈和我三人在一起商量，认为北方政局腐敗，是我們所亲眼目睹的，軍队不能打仗也是事实，但南方动态究竟如何，却不敢轻易相信，最好能有一人亲自去看看。王、张两人认为我是广东人，如果前去，比較不惹人注意，我也同意以探亲为名回家乡去一趟。

我到广州，看見那里各方面情形，另有一番新气象，和北方完全不同，住了一时就回来。不料路过南京时，被孙传芳知道行踪，派人約我去談話。我原无意見他，但又不便推托，只好勉强去应付一下。孙首先問南方情形如何，"赤化"能不能成功？我推說他的消息灵通，一定比我知道得还清楚。孙进一步用請教的口气征求我的意見說："你是我們的老前輩（孙是日本士官学校后期学生），大家可以暢快談談。张作霖是土匪，蔣介石是流氓，两个人都来拉攏我，你看我和那一个人联合比較好？"孙接着又說："北伐軍很能打仗，不容易抵挡。"我当时心里想，这种重大的事情，岂可以随便答复，

只好用空洞的話来搪塞一下。不料我回到北京时，孙已和张作霖搞在一起了。我看到南北政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就和王克敏、张嘉璈两人商量，由王和我留在北方，应付北洋軍閥，张嘉璈因母病很重，正好赶到上海，就地与国民党联絡，相机应付。这种局面，一直維持到1928年总处搬到上海时为止。

张作霖、蔣介石向中行强迫借款

我在北方多年，熟人很多，維持中行局面，本不致有什么問題。不料有一天，駐在保定的奉軍第三、四方面軍团部，忽然派一參謀到中行总处来找我說，他們有一笔进口押汇的軍火，約值三十万元，在未交貨付款前，洋行方面要求銀行担保，张学良要我以中行名义签字担保。我因茲事关系重大，推說須经董事会通过，而当时各董事散居各地，无从召集，难于照办。对方坚持不允，最后說要派一副官带領宪兵四人护送我到保定去見张学良，当面商量。我想此事不妙，遂找陆軍次长楊毓珣設法。楊說："千万不可同去，否則便沒有办法。"即由楊亲自找张作霖說明原委，一場虛惊，才算平安渡过。

张嘉璈在上海应付国民党政府的需求，也不是很順利的。他和黃郛、陈其采、錢新之等人，原来都是很熟的朋友。当北伐軍到上海时，国民党就指派陈、錢等人組织江苏兼上海財政委員会，中行由吳震修代表參加。有一次这个委員会議决，先凑二五庫券垫款一百万元，送到南京去，要中、交两行各担任五十万元。先是錢新之与宋汉章商量，宋不允垫借，后由吳向宋劝說，宋仍坚决不答应，并且說："孙传芳軍队，已经过江来了。"吳看到这事无从下台，就賭气不管，一个人溜出边門跑去看电影。因为这笔垫款发生波折，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